



在權利義務的天秤上，我到底是誰？

権利義務の天秤において、私は誰なのか
Balancing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o Am I, Really?

文・圖 | 松予安Savi Isqaqavut (誠品書店店員)

「你記得自己是誰嗎？」

初始迷惘

在都市成長的原住民青年，自小便能從教育環境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之於漢人的不同。這些不同大多不是來自文化的碰撞，反而是藏在日常的夾縫中，或許是旁人提起原住民時不經意透漏出的既定印象，又或許是求學過程中，那些不時投向你的眼神以及刻板期待。這個世代的原住民青年在水泥都市中被敏銳地貼上了以族群為邊界的標籤，然而，當你轉身面對遙遠又陌生的傳統祭儀、幾乎被身體遺忘的語言，以及被視為「家」卻又未曾落地生根的部落，內心深處卻會被名為「心虛」以及「迷惘」的霧氣籠罩著。假如



布農之初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身份認同僅停留在血緣事實，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轉化為實質的傳承，那麼在高度競爭、凡事講求效率與分數的都市生存模式中，「我到底是誰？」便成了一個難以迴避且帶有本質性內耗的詰問。

隨著111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與《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將原住民身份認定正式與姓氏解綁。這項變革在世俗法律層面上，保障了個人認同，讓取得身份的門檻變得空前彈性與便利。相對地，這場去中心化的法規鬆動，卻影響了關於分配正義、權利對等與文化責任等倫理問哉。當法律不再用「姓氏」作為要求個體付出責任、維繫民族邊界的堡壘，我們享有的一切優惠資源，究竟是一份承擔文化義務的責任，還是一場趨利契約？此法案的修正將如何影響以「氏族」維繫民族邊界的布農族？本文將透過與布農族長輩以及都市原住民青年（都原青年）的觀點，探尋和剖析在這條逐漸鬆動的邊界上，我們所面臨的道德拉扯與時代迷惘。

姓氏背後的氏族秩序

為了理解這場法治變革對文化體系所帶來的衝擊，我首先詢問了布農族學者海樹兒·

亥刺拉菲（Haisul Palalavi）老師。老師強調，在布農族的傳統文化中，「氏族（siduh）」是社會組織運作、倫理關係乃至獵場劃分的絕對經緯，更是規範通婚與避免亂倫（masamu）的核心防線。然而，戰後國民政府賦予的漢姓混亂了傳統氏族系統，導致 siduh 與被迫使用的漢姓高度不對稱，同一個 siduh，例如 Palalavi 氏族，可能在台東姓余及胡（利稻村部分 Palalavi 氏族），在南投姓松、在高雄桃源區姓張，那瑪夏區則姓李；甚至出現相同漢姓卻屬不同氏族，或同氏族卻異姓的混亂現象。這種斷裂已然影響婚姻禁忌的辨識，使年輕一輩容易喪失氏族意識。

如今門檻全面放寬的制度變革，海樹兒老師的憂慮更是一針見血：大法官在缺乏原住民代表與民族學或人類學專業的情況下逕行裁判，剝奪了各族群內部的傳統認定機制（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成為我們族內的成員）。當身分門檻徹底鬆動，大批思維已是漢人、僅僅因具微薄血緣的原住民將大量湧入；然而國家特別預算不可能無限擴張，這勢必會直接稀釋並傷害到資源本就匱乏、真正部落出身原住民的

實質權益。更令人擔憂的是，未來在原住民權益與政策決策的金字塔頂端，恐將由這些缺乏部落生活經驗與自治的個體所掌握。

面對民族邊界日益模糊與文化特徵稀釋的危機，海樹兒老師指出，當務之急是透過守住「民族語言」與傳統性的民族文化活動（如祭儀文化）之傳承與參與來減緩邊界的消解。他期盼未來的原住民族福利與權益保障能與族語的傳承（如族語認證機制）及民族文化的參與學習經驗更緊密結合，至少要求新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共同承擔學習

長輩們的嘆息指明了一個歷史現實：法律看似保障了個人認同，卻在無形中解構了傳統氏族與內部認定機制。



與傳承民族語言文化的責任，讓族群根基得以在都會與世代轉變中延續。

都原青年的反思

新法正式施行後，身處都會區的原住民青年在面對政策資源與自我認同之間，心中的拉扯與矛盾顯得更加貼近現實。受訪的都原青年在對話中，誠實地表達了對自身處境的思考。他提到，在都市環境成長的他們，早已習慣於競爭激烈的學習步調與考試制度，這與部落的生活經驗確實存在差異。而面對升學優惠等政策美意，他不禁思考，這些原本為了改正、彌補過去並實現實質平等的措施，是否真能精準地回應偏鄉部落孩童在資源上的根本需求？對於在都市奮鬥的原住民青年而言，優惠政策雖然帶來了便利，卻也無形中形塑了旁人的既定印象，使得他們在學習路上所付出的汗水與自身努力，有時容易被政策標籤所掩蓋而不被看見，甚至在校園同儕間帶來隱微的心理壓力與隔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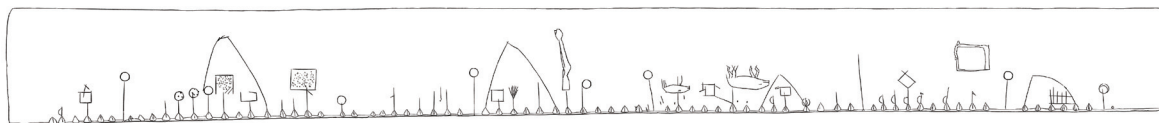


崙天部落內文化意象一景（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此外，新法案讓個體能在保有原生活狀態的同時取得身分，固然給予了個人認同極大的彈性與保障。然而，若從族群傳統的視角出發，這項改變也帶來了倫理上的新課題。在布農族的傳統思維中，氏族連結著清晰的家族情感與社群責任；若缺乏實質的家族連結與文化參與，僅憑法律規範來界定身分，容易讓權利與文化義務之間產生落差，甚至引發族人對其動機的疑慮。這種權利與責任的微妙失衡，若未經過深層的文化自我省察，容易使個體在高度競爭的都市生活中模糊了自身的根基，讓認同僅止於形式上的制度保障。

教育的任務則在於教導下一代明白，原住民身份不應只是一個「工具」，而是一份承擔文化傳承義務的責任。當制度不再強制規範義務時，我們更需要透過教育的陪伴，讓都市青年在法規鬆動的迷霧中，自發地走向深化的認同。





【祭事曆-3】Qanituan（加年端，カネトワン）社第三塊祭事曆。藤澤 收自Qanituan社（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從被動到主動

當法律的圍籬倒下、邊界不再具有強制的門檻時，原住民族教育正面臨空前的挑戰。此時的教育必須由福利制度與資源的宣導，轉換成力求建立深層文化使命感為目標。在當前的校園環境中，許多針對原住民學生的教育仍停留在表象，僅在特定節日進行歌舞展演，這使得生活在都市的青年，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實際的文化連結。當制度不再強調家族姓氏的約束時，如果學校教育無法引導學生建立內在的認同，身份便容易退化為純粹獲取優待資源的工具。如同海樹兒老師在訪談中將希望寄託於部分特定場所、場合，例如透過學校社團、教會、都會祭儀等文化實踐，期盼透過族語認證與實際參與民族文化，至少讓語言與傳統智慧在都會區得以傳承，讓都原青年有機會與土地結合。教育的任務則在於教導下一代明白，原住民身份不應只是一個「工具」，而是一份承擔文化傳承義務的責任。由此可見，當制度不再

強制規範義務時，我們更需要透過教育的陪伴，讓都市青年在法規鬆動的迷霧中，自發地走向深化的認同。

Paiska laupaku 從此刻起

面對名為「沉重」的文化責任，在與都市原住民青年的訪談中，他分享了一條能夠努力實踐的路徑。身為都原，我們不一定非要被動地承擔宏大卻遙遠的傳統包袱，而是可以選擇「另闢蹊徑」。我們可以先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光發熱，用實力破除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在未來擁有資源與人脈時，回頭為族群提供實質的贊助與交流機會。

這場實踐在本質上就是一場漫長的「回家」旅程。對於

一位幾乎快要忘記自己是誰的都原青年而言，「回家」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位移，而是一場重新與家族、土地與血脈建立真實連結的復歸。我們透過深入理解自己的傳統名字，探尋每個姓氏背後的意涵與遷移歷史，或是用自身在都市累積的能量回饋部落，都是我們向家族立下的無聲承諾。當我們帶著在都會淬煉出的底氣主動走向我們的家，窗外那座城市漫長的春日或許已經走到了盡頭，但在逐漸冷卻的時代餘燼裡，我們終將在回家的路上，邁開步伐堅定地回答深埋心底的叩問——我到底是誰。◆



松予安 Savi Isqaqavut

新北市淡水區人。布農族。2004年生。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輔修哲學系畢業。現任誠品書店店員。目前是一名觀察人類的書店店員，喜歡聽故事，長期關注原住民無形文資議題，對所有關於尋根與找回族群記憶的歷程感興趣。